创新全球治理 中国大有作为

本报记者 顾 阳

继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之后，博鳌亚洲论坛有关“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话题持续升温和发酵。在29日举办的“头脑风暴：全球治理新思维”午餐会上，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WTO前总干事拉米等嘉宾就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WTO与多哈回合的未来、联合国作用等话题展开热烈探讨。

作为博鳌亚洲论坛今年5名新增理事之一，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对全球经济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货币环境，以及能源价格的大幅下跌，将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肖卡特·阿齐兹认为，尽管当前全球资金流动性充足，但新兴市场治理还有很长路要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来自持续不断的结构性改革，而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的。

回顾近年来全球对于国际问题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当前的全球治理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比如旨在推动全球减排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始终步履蹒跚，旷日持久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尚待突破，发达经济体新贸易规则中保护主义盛行等。此外，在积极扭转海洋枯竭趋势、应对汇率波动、逃税和网络犯罪等诸多领域，全球治理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在WTO前总干事拉米看来，全球化之后出现的新兴经济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方之间的实力平衡。它们凭借市场贸易和信息科技，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和水平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尽管如此，这一力量的出现并未能阻止不平等程度的上升。

化解“不平衡”的路径在哪里？与会嘉宾指出，在完善全球治理现有机制上，一方面仍应高度重视G20、联合国体系和专业性国际组织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主动争取话语权的基础上，应积极寻求增量改革的空间。拉米表示，未来框架之外的治理也将有机会取得更大进展。“例如，持续的区域整合已经催生出欧洲、亚洲、非洲和中美洲不同的‘迷你全球治理模式’。与传统治理体系相比，通过纳入新的机构来建立创新性合作关系，或许对资源的利用更为有效”。

作为本届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亚投行的设立被普遍认为将对现有治理机制产生积极的补充和促进作用。有“中国通”之称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一直力挺亚投行的设立，在此前举办的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分论坛演讲中，他就明确指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将给世界和亚洲经济带来重要飞跃。“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都不够，‘一带一路’和亚投行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已不能反映全球经济力量的最新变化，这在客观上倒逼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建立新的金融机构，亚投行的设立正逢其时。多位接受采访的与会嘉宾表示，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要努力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在未来全球治理的舞台上，中国理应有更大作为。

博鳌随想

人工智能刚刚起步

牛 瑾

人们总是期待生活能够越来越便利，“呆萌暖男”智能机器人大白满足了人类的这些粉红幻想，所以迅速蹿红了；人们又在担忧太过便利的生活让人类没有了存在感。所以，“人工智能是天使还是魔鬼”的争论成了热点话题。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一场分论坛上的两次投票结果颇能说明问题。

如今，是弱人工智能时代，抑或已经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演讲嘉宾几乎是一股脑地把票投给了“弱人工智能时代”。

我们总是会把人工智能与科幻电影联系到一起，认为其缺乏真实感。其实，人工智能早就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了。比如，能够自动驾驶的汽车、能够战胜国际象棋冠军的电脑。但无论哪一种，都不比人类更聪明。自动驾驶的汽车上装有各个方向的传感器，能力肯定比只有两只眼睛的人类强；打败世界冠军的电脑，也只是因为被人类嵌入了下棋的模式。说到底，今天的人工智能只停留在泛化层面，只有产品化的体现。

而强人工智能时代，强调的是在各方面都能与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但是现实中，造摩天大楼、把人送入太空、探明宇宙大爆炸的细节……这些让不少人大脑“打结”的问题都比理解人类的大脑简单太多了。所以，目前远未达到人类脑力所及的强人工智能时代，要想让机器人主动给你献花，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第二项投票是关于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意义，乐观或悲观？结果又是高度一致的：乐观。

首先，这要归功于目前只是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刚刚起步，现在就来讨论“婴儿期”的人工智能“长大”后会不会变成恐怖分子，未免太过不切实际，这就像担心火星上迟早会人满为患一样。

其次，即使进入了强人工智能时代，也要看人类用怎样的方式去使用它。技术本身只是一个工具，是使用技术的人帮他选择了天使或魔鬼的面具。人工智能再先进，也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是人类的“孩子”，人类知道怎么去掌控它。现在需要做的，是更加关注塑造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其需要比发展技术更长的时间。只要把人工智能应用放在文明和道德的框架下，相信人类就一定能管好自己的“孩子”。

所以，人工智能毁灭人类？别逗了，除非有人把它变成了魔鬼！

新技术“三大咖”——

实话实说技术创新

本报记者 禹 洋

3月29日的早餐会是当天颇为“吸睛”的一场对话，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传奇式的创新人物、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SpaceX和Paypal的发明者、特斯拉汽车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3位“大咖”齐聚一堂，探讨技术与创新。

作为这场对话的主持人，李彦宏事先做足了功课。早在两周之前，他就在百度贴吧上发帖，公开征集网友最感兴趣的问题。“一个非常有抱负的年轻网友希望超过您，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想知道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果不其然，论坛一开始，李彦宏就抛出了网友提出的“高大上”问题，语惊四座。

相比这个“宏大”的问题，比尔·盖茨的回答却很朴实，“成功最重要的一点是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创业之初，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门心思地设计出更好的软件，让计算机更好用，完全没有想过微软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当时，团队中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比尔这么努力，即使他现在是错的，总有一天也会把错的纠正成对的。”比尔·盖茨认为，所有的创新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他还特别强调，年轻人一定要多读书，随时补充新的知识，为脑中闪现的新想法找出理论支持。

埃隆·马斯克这位跨领域发展的创新奇才则有不同看法。“我十几岁开始写软件，用卖软件的钱买更好的计算机，然后创造更尖端的东西。”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断找到新的兴趣点，用以前积累的资本创造更新的技术。创新还需要团队的力量，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赚钱不是创新的目的，但反过来讲，创造出了有用的东西，钱自然就来了。”

“博鳌亚洲论坛不是一个纯粹关注技术的论坛，还有各国政府官员的参与。两位对国家在创新中的作用怎么看？”论坛进入后半段，李彦宏出人意料地把话题转到了国家创新环境的培养。

“我绝对支持由政府主导，营造鼓励技术创新的大环境。”埃隆·马斯克说。对此，比尔·盖茨认为，各国国情不同，但在培养创新环境方面，可以取长补短，借鉴成功的经验。

此前，媒体纷纷预测，今年大热的“人工智能”一定会是3位“大咖”讨论的焦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李彦宏提出搭建“中国大脑”，希望通过国家层面的推动。但在去年，马斯克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警惕人工智能的观点。对于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出道早”的过来人比尔·盖茨作了个中性的总结。他说，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的关键是在发展中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不能操之过急。

论坛聚焦

□ 本报记者 徐惠喜

携手打造亚洲互联互通新模式

图为博鳌嘉宾就亚洲互联新模式进行辩论。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在亚洲互联互通建设当中，中国一直走在前列，给区域一体化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3月29日，一场题为“亚洲互联新模式”的辩论会，吸引了不少博鳌论坛嘉宾的眼球。参加这场讨论的嘉宾既包括印尼前贸易部长冯慧兰、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格鲁夫、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和高盛亚太区副主席哈继铭。他们就亚洲的金融合作、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展开了思想碰撞。

如何展望亚洲互联互通的未来？

林毅夫认为，这将促进亚洲生产力提高，驱动亚洲经济持续增长。格鲁夫称，亚洲各国间互联互通不断加强将进一步推动亚洲经济繁荣，减少贫困，并带来更多增长。樊纲表示，把主要的工业和交通枢纽互联起来，将大大造福于地区人民。冯慧兰则以印尼的数据为据，称印尼60%的贸易投资和旅游是在区域内发生的，互联互通不光是为了增加向欧美出口，亚洲本身就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增长空间巨大，如果基础设施到位，经济增长将更快。哈继铭说，互联互通后，亚洲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亚洲在全球经济的占比会进一步上升。马丁表示，这是亚洲一体化的新阶段，是亚洲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奏。

要想引领亚洲的新互联互通，需要做哪些工作？

格鲁夫强调，亚太地区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巨大，亚行研究认为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需求高达10万亿美元，为此必须调动各方积极性，各种不同的融资者、投资者、投融资机制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哈继铭表示，亚洲许多国家还没有高铁，许多城市没有地铁。嘉宾表示，亚投行的开放包容原则是一个多边金融机构治理的好原则。刚开始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需要基建投资。最近则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申请加入，愿意搭上亚投行的列车，分享亚洲的发展机遇，这是大势所趋。

在互联互通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个全球化和效率间的取舍问题。樊纲称，亚洲金融危机前，IMF倡导资本项目完全兑换，危机发生后这种言论就销声匿迹了，这表明国际组织倡导的全球化原则并不完美，更重要的是注重效率。现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新的机构，开展一些新尝试是好事，找到一些好途径，有利于丰富国际经验，形成新的全球化。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需要区域性机制来补充多边机制。再说，在国际治理体制中，不能由一两个国际组织说了算，应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亚投行等新组织。

亚洲互联互通面临自贸区碎片化挑战，如何整合？

2002年以来，亚太区的自贸协定数量增加了4倍，目前已达144个，还有140个仍在谈判当中。这种碎片化自贸协定给各国企业造成很大不便，如何整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亚太自贸区是嘉宾们开出的药方。冯慧兰表示，TPP始于一个叫做黄金准则式的总体协议，包括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知识产权保护，有非常严格的加入标准，而RCEP主要是模块化建设思路，先有东盟，然后再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国以自己舒适的方式加入其中，形成现在的16个成员。可以说，将来的发展目标就是亚太自贸区。

图说

图为“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未来：魔鬼还是天使”分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3月29日举行的“对话：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早餐会，吸引了众多嘉宾参与。 本报记者 禹 洋摄

金砖国家大法官就“重典”治污进行对话。 本报记者 徐惠喜摄

高端访谈

□ 本报记者 徐惠喜

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访德勤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

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就国际金融体系变革、亚投行扮演的角色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等话题，接受了《经济日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为支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广受诟病，你怎么看待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

许思涛：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缺陷是公平问题。回顾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不断发生。国际金融组织对危机的处理，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双重标准，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救助亚洲国家时附加了很多苛刻条件。而在欧洲债务危机期间，国际金融组织对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就宽容多了。处理危机的时候不是同一个标准，没有一碗水端平，这让大家产生了疑问，也是其广受诟病的原因所在。另外，IMF和世行有不成文的规定，主要高级官员大都来自西方。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就很小，与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不符。

记者：大家都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进程受阻，你认为如何才能打破这一僵局？

许思涛：最好的办法就是引入竞争机制，竞争能促进大家做得更好。中国经济的崛起，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话语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发起成立新的国际金融机构也就水到渠成。

记者：除了亚投行，还有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它们的推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对于国际经济治理会带来哪些影响？

许思涛：亚投行等机构的出现，将增加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同时增加国际治理体系的包容性。例如，亚投行的成员既有实际上最富裕的国家，如英法德和卡塔尔，也有比较贫穷的国家，如柬埔寨、尼泊尔，这些成员的加入本身就证明了亚投行的包容性。此外，亚投行与主权国家的利益没有那么大的直接关系。据了解，一些国家为此做了很多妥协和让步，甚至可能放弃否决权。这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所言，“一带一路”是中国同其他国家一起做的事情，不是中国自己在做。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会产生哪些影响？

许思涛：中国与多个国家签订双边本币互换，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有助于促进亚洲金融稳定。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即使有意愿帮助他国，市场也不会相信，因为那时候中国的实力还不够强大，人民币蒙受贬值冲击。但今天不一样了，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有巨额的外汇储备。

人民币国际化对国际金融体系来说，影响是正面的。现在国际上有很多东西大家看不懂，为什么全球的利率水平这么低？这其实跟人民币国际化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如果中国不拥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人民币没有走出国门，国际市场的资金成本将出现上升。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压低了国际市场的资金成本，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本版编辑 梁图强 李红光